

京派文学中的空间生产

Spatial Production in the Beij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戴潍娜 (Dai Weina)

内容摘要: 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框架, 结合女性主义视角, 考察从“京派”到“新京派”再到“大京派”的历史演进如何参与塑造京津冀地区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地图。早期“京派文学”以审美趣味建构超越功利的诗意空间; “新京派”以“博雅之气”整合地方记忆, 亦隐含文化权力的排他性; 至“大京派”阶段, 京津冀三地作家共同参与区域再阐释, 重绘多中心、协商性的空间想象。在这一过程中, 女性作家的创作持续挑战着性别化的空间秩序, 始终是塑造京派文学空间想象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理论对话和文本细读, 揭示文学、空间、性别权力相互生产的复杂机制, 为理解地方书写和文化认同建构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 京派文学; 新京派; 空间生产; 现代性; 女性文学

作者简介: 戴潍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原理研究”【项目批号: 22&ZD284】阶段性成果。

Title: Spatial Production in the Beij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Henri Lefebvre's theory—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examines how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e Beij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through the New Beijing School to the Greater Beijing School has participated in shap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ymbolic geography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Early Beij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onstructed poetic spaces that transcended utilitarian concerns through aesthetic sensibility. The New Beijing School sought to integrate local memory through a cultivated spirit of erudition, while also implying forms of cultural exclusivity and symbolic power. In the phase of the Greater Beijing School, writers from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collectively engaged i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region, redrawing a polycentric and negotiated spatial imagination.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female writers have continually challenged gendered spatial orders and have remained a key force driving heterogeneity and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dialogue and close textual analysi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omplex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literature, space, and gendered power relations

are mutually produced, offering a new interpretive pathway for understanding regional wri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Keywords: Beijing school; New Beijing school; spatial production; modernity; feminist literature

Author: Dai Weina is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mail: weinadai@qq.com).

文学以其特有的命名、叙事与符号体系，持续参与着对空间的塑造与赋形，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空间的占有、感知与体认。“城市是我们新的本质，是一片不结果实的新森林，一个神话般的童年多边形，一个充满希望和抱负的陵墓（……）这座城市是一些地理常数或文化变量的表现”（戴潍娜 61）。在地理常数之外，流动而丰盛的文化变量往往承担了城市空间和文化记忆的生产工作。文学真正进入了城市内部，编织出其细密的肌理，支撑了有关城市的想象。某种意义上，它生产城市可被理解的形态，也生产城市可被栖居的方式，更生产城市可被体认的历史。亨利·列斐伏尔（H. Lefebvre）为城市研究找到了崭新的动力和参考物，提出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包括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社会空间的整体。¹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为我们进入文学提供了新的思想工具。文本可以被视作一种复杂的空间实践，其蕴含了特定权力结构下的空间秩序和特定文化情境下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塑造着读者对现实空间的感知。

当我们以此切入“京派文学”时，会发现“京派”这一概念远不止是一个地域标签或美学流派，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空间生产”现场，始终进行着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自我的探索。京派文本中那些反复出现的看似闲适的庭院、有趣的胡同、安静的闺房、客厅，风雅的文人沙龙，实则无一不是地域文化建构中权力角逐与主体抗争的重要场域，其中上演的远非闲适的审美游戏，而是对何谓“北京”，何谓“文人”，何谓“现代生活”的种种诘问、协商与争夺。因而，对京派文学的深入勘探，必然要越过风格与趣味的浅层探讨，去深入审视地域文化认同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争夺、想象和书写；性别政治又如何深刻地渗透于上述感知、构想与生活空间的每一个维度。这使得京派研究超越了传统文学史范畴，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知识主体的空间感知、性别政治与身份困局的重要思想现场。

而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空间的生产与性别权力之间更潜伏着一条幽深密道。传统社会结构中，空间分配呈现出鲜明的性别不公正，女性被困锁于以

1 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30页。

闺阁为代表的私密、边缘空间，其活动空间始终受有形与无形的限制；而男性则通常主导着街道、广场、讲坛等公共领域，且以此不断勾勒和再生产人类公共空间的边界。这种性别化的空间区隔，往往率先在文学、绘画、戏剧、艺术等表达中被锐利地质疑，随后才逐渐在现实中获得改写的动力。在那些被窄门和纱窗包围的生活缝隙里，女性作家以细碎的日常实践，悄然消解、抗衡，甚至再造着属于自己的隐秘疆域。她们通过书写，创造性地将边缘或私密经验转化为具有抵抗潜能的象征性空间。因而，在京派文学研究中引入女性主义视角，意味着重审女性在社会结构中所被赋予或剥夺的空间经验，由此揭示该文学传统内部那些长期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性别政治与叙述可能。

一、“京派文学”的诗意空间生产

1920年代，一批作家以同频的文学理想和美学追求聚集，组成了松散的“京派文学”阵营。相对于彼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作家圈，京派作家们崇尚趣味空间，以独特的文化姿态反对文学的功利化。关于“京派”与“海派”的对峙，文学史上还有过“京海之争”。严家炎先生详尽刻画了这场论争的肇始——“这场论争是作家沈从文首次发动的，锋芒所向，直接指到了一批商业化的‘海派’作家（……）于是，上海的苏汶站出来，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反唇相讥，回敬了沈从文这个‘北方的同行’”（206）。1934到1935年间，鲁迅先后发表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多篇文章加入论战。他着力强调北平作为文化古都所特有的历史积淀——“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鲁迅全集 第5卷》302），实质上是从空间文化的角度，为京派文学的精神根脉提供辩护。严家炎在论述京派小说时指出，其代表作家包括废名、沈从文、凌叔华、林徽因、萧乾等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名单中，女性作家凌叔华和林徽因都与日后的北京空间建构有着密切关系。

相比于海派文学在长三角商业文化建构中泛化的商业空间，鲁迅的兄弟周作人，则在这一段历史中生产出了一番超越功利的诗意空间。京派文学反对商业化、功利化的文学观，不仅是“京海之争”的表面现象，更深层次体现在周作人等人的文化理想和社会构想中。周作人不仅通过“人的文学”倡导“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艺术与生活》9），更借助对日本“新村运动”的引介与诠释，建构了一套系统的社会文化理想。“新村运动”这个提法最初来自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Saneatsu Mushanokoji），其主张“泛劳动”与“协力的共同生活”，追求个人与社会和谐的统一。周作人感叹其“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既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正中普遍的人生的福音”（《艺术与生活》206）。尽管这是一场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运动，但其对劳动价值的重估，对商业剥削的抵抗，以及对共同体生活的设想，皆与京派文学

拒斥功利，追求精神自主的文化立场相合。仅将“新村运动”视为周作人受日本白桦派影响的思想组成是远远不够的，它是周作人用以构建超功利诗意空间的一张蓝图。可以说，新村运动几乎完美契合了周作人心目中的人与社会的理想关系，试图在个体与集体、审美与实践之间建立一种充满弹性的人文空间，从而实现京派文学对现实功利的有意识疏离和美学超越。

进一步看，这种由周作人所倡导的、融合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人学”观念，亦为现代性别议题的展开奠定了早期的话语基石。周作人希望国家与个人之间能够和谐地共生，他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说：“提倡国民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周作人书信》49）。在周作人看来，人具有二性，一是人性；二是个性。人性中同时包括爱他人与爱自己。既要有人性也要有个性，既要爱他人也要爱自己，既要有个性又要通人道。他把个人主义看作人道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一切都是他的“人学”，也是女性学、儿童学的思想基础。事实上，民国初兴的诸多新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仰赖于这一“人的发现”，并曾在京派文学超然的思想中汲取过营养。新村运动虽未能实现其社会变革理想，但其对理想社群关系的探索、对个性与协同的并重，客观上为重新想象性别关系与社会空间打开了可能。然而，周作人最终退回到“苦雨斋”，也暗示了这种诗意空间生产的局限性：它或许能在观念中开辟一片审美自洽的领地，却难以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实现人文理想。而理想和可行之间的裂隙，恰恰成为京派文学超越功利的“空间生产”中一个持续存在的辩证焦点——艺术在京派的文艺圈子里日渐变成了一种远离现实的情绪的操练。

二、隐秘与公共：京派女性作家的空间叙事

在京派女性作家中，凌叔华的创作以短篇与散文见长，其叙事常以庭院、夹道、后花园等微型空间为中心，意象虽小，却是她认知城市、体悟自然、建构内在世界的通道。凌叔华离开故土赴英多年，她的作品中对旧北京的家族情感不时地显现，所书写的边缘空间，乃是历史的裂缝。种种花木、水石、假山与她的童年、家庭乃至家国命运紧密编织在一起。林徽因在建筑论著和散文中，也将旧都北京的残垣断壁平添隐喻意味，建起一种介于怀旧与想象之间的诗意场。

凌叔华的小说常把视角锁在深闺或远游之后的孤寂，将目光聚焦于被历史抛置的女性。无论是文化身份的疏离，还是性别困境的压抑，都让她的叙述自觉或不自觉地游走于主流叙事的边沿。她在自传中回忆道，童年时家中后院有假山与茅亭，攀上石山方能俯瞰彼岸绵延不断的西山。日后的书写中，她多次将山水视为知己、长者、玩伴，甚至情人。在《爱庐山梦影》中，她说：“近来我常在雨后、日出或黄昏前后，默默地对着山坐（……）我对着山的心情，很像对着一个知己的朋友一样，用不着说话，也用不着察言观色”（3）。作为

一位“新闺秀派”女性作家，她所见的自然并非仅为宏阔的风景轮廓，而是更加细腻的空间变奏：山的静谧、云的柔和、流水的低语。正如她在作品中同样很少谈及显赫的社交场面或政治事件，而是聚焦于私人与隐秘生活：儿时的庭院梦，旅途中的新奇印象，或是内心情感的悄然涌动。这种微型空间成为她成长、回忆与文学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异，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里构建起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公共空间，成为北平文化生活的一个中心。如费慰梅所评价：“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转引自 田时雨 119）。这些京派女性作家不仅在场，而且建场：她们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女性缺席公共空间的传统，于文学的版图上破土筑城，成为空间的缔造者。那些或私密或半开放的空间，是京派女性内心世界的暗室与镜像。她们既渴望自由而又惧怕自由，既想走出门去，又恐被命运的丝线悄悄牵引。她们的书写，为文学世界注入了“她者”的灵魂，并拓展了其边界。此外，学校则是另一种现代性的空间想象。女性在这里以学生身份出现，暂时抛却家庭的重负。课堂、图书馆、社团，成为思想生成的中介。凌叔华和林徽因描绘中国女性在社会转型期里的复杂处境。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来源于“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中产阶级或新式家庭：这些女性接受过现代教育，开始追求自主，却又深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和禁锢，往返于内与外、私密与公共、传统与现代之间。

三、小径分叉的“新京派”文脉地图与空间变奏

如果说以凌叔华、林徽因为代表的京派女性作家通过对私人空间的公共化转换，从内部松动了传统性别化的空间秩序，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京派”文脉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空间生产变奏。其中女性视角的切入，持续构成对男性话语主导的主流空间建构的隐性反思和挑战。列斐伏尔将语言重新视作一种空间的生产工具，他在空间生产理论中指出，语言不仅是交流和表达的工具，更是空间生产的重要媒介。¹从旧文人笔记中的宫墙内的北京，到凌叔华精英主义大宅门里的北京；从老舍和邓友梅笔下落魄八旗子弟的北京，到萧乾、汪曾祺关切的养穷人的缝儿里的北京，这个城市的多重历史维度和空间层次，皆在文学作品中以千丝万缕的线索铺展开来。京派文学塑造了北京的景观，展示了这座城市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独特风貌，使其成为一个充满故事和幻觉的空间，且这个空间在文学符号的编码中永不停歇地流动和延伸。孙郁先生在他论述“新京派”的文章中归纳了端木蕻良、汪曾祺、张中行、季羨林、启功、王世襄、宗璞等一批作家知识分子对于京派传统的继承和革新，认为他们为文化界吹入了一股“博雅之气”，指出从“京派”到“新京派”这一路作家所代表的审美趣味，可与王蒙提出的“作家的学者化”命

1 参见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0-13页。

题形成对话。¹事实上，这股“博雅之气”在空间生产的层面，首先体现为一种将日常生活与历史积淀予以审美化与意义化的空间建构。譬如汪曾祺，意到笔随，带出无数日常生活的美与细节，通过对茶馆、街巷、店铺中气味、声音与人物情态的细腻捕捉，化出浑然天成的个性趣味空间，为京派文学注入活力，在感知空间的维度上，将琐碎日常提升为一种诗意栖居的平民生活哲学。再比如端木蕻良在他的作品《大地的儿子》中，将北京的前世今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充满生命力和史诗厚度的历史空间，塑造了一种融通古今、典雅深厚的空间意识。与之相异，张中行的散文集《负暄琐话》从对历史遗迹的追忆中构筑文化守望者的精神空间，他的空间生产机制更侧重于“记忆的考古学”——那些逝去的风物，经由文字擦亮，被重置于文化史构想空间之中，以此抵御现代化带来的遗忘与空间断裂。诚如王蒙先生所言，“作家的学者化”不仅体现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深度和广度，也折射出对历史传统自觉承接的文化姿态。²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博雅之气”为内核的空间生产，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文化权力场域，确立了某种以特定智识资本和文化趣味为门槛的排他性机制。正因如此，女性作家在“新京派”语境中获得了某种辩证意义，迫使她们以更具异质性和反思性的方式介入空间书写实践。在空间生产理论中，语言、空间和活动三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当它们之间不能互相建立解释和理解时，就出现了相互之间的断裂。相较于京派传统对闺阁空间的凝眸，新时期北京女性作家的笔触更多转向广阔的社会舞台和内心世界，其创作反映出与前辈迥然不同的空间体验。以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自白派”为典型，这些文本通过对都市白领日常生活的微叙事引发共鸣。一方面，新时期女性摆脱旧式家庭的禁锢，文学由此获得表现女性公共生活空间的新题材；另一方面，尽管外部空间扩大，女性在社会空间中仍然面临诸多隐形天花板和心理困境。张洁的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1980），经由一位女青年对母辈爱情往事的追忆，呼唤爱情自主和个体价值，被誉为新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先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1985）以迷茫叛逆的都市女孩形象，打破以往京味文学的叙事范式，语言直率泼辣，成为现代派小说的先锋之作。她们均以强烈的心理化倾向，将“生活空间”的生产从外部地理空间转向了内在呐喊，以异质性的声音打破了空间的同质化。传统京派作家笔下那种幽雅闲散、守在四合院里的暧昧氛围，已难觅踪影。总体而言，“新京派”文学的空间生产具有承继与变革的双重性：它既继承了京派关注都市文化和市民生活的本色，在北京丰富的地域空间上挖掘文学意义；同时，它也突破京派“小圈子”的局限，将北京文学的空间拓展到更为异质性、流动性的多元宏阔的复调空间。在这一复调空间中，女性视角不仅是重要的组成

1 参见孙郁：“从京派到新京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6（2022）：1-7。

2 参见王蒙：《王蒙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24-134页。

部分，更是一种批判性眼光，持续照亮着空间叙事中那些被主流遮蔽的褶皱暗影。

四、大京派视域下的文化地图与多元空间生产

“新京派”以其“博雅之气”与“学者化”倾向，深化了北京作为历史文化中心的空间建构，但本质上仍侧重于单一城市的、以智识趣味为核心的话语共同体。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来，有刘勇、陶梦真等学者提出“大京派”的文学概念¹，认为“大京派”超越了“新京派”相对局限于北京城的视野，转而从燕赵文明同根同源的历史地理基底出发，使得文学的空间生产不再仅仅围绕“北京性”展开，实现了更具包容性的区域文化认同和空间想象跃迁。在这一广阔视域下，在复古与创新并置的语境中，文学创作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空间书写策略。在这张小径分叉的文脉地图中，年轻一代“大京派”作家们的声音清晰而有力，在题材选择与空间书写策略上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代际取向。大城市与小镇、乡村在文学中往往处于对立面，在年轻一代的书写中，北京代表了现代性和流动性，诚如“大京派”中领军人物徐则臣所表达的——“大地在扩展，世界在生长”（4）。徐则臣的小说《北上》以大运河为叙事轴线，其空间生产机制是“河流时间性”对“城市中心性”的改写。运河不再仅仅是背景，而是一个能动的主人公，从而象征性地构建了一个崭新、流动的空间想象。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侯磊在《北京烟树》中采取的“微观地理学”路径，他的散文集《北京烟树》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入手，带着读者从北京市东城区的北新桥十字路口出发，向北走到地坛，向东走到簋街，向南走到隆福寺、王府井，再向东走到位于朝阳区的三里屯（工人体育场）、八里庄、十里堡以及位于通州大运河的支脉。这些行走路径和观察经验，转化为一篇文章写作的对象与材料：《“大北新桥人”》《地坛有神》《簋街秘史》《上溯隆福寺》《东安市场：一百年的买买买》《九比一》《红砖楼：三里屯·八里庄·十里堡》《通波：北京的大运河》等，其写作与文化空间紧密结合，每一条胡同和街巷，都被他写出了胡同志和街巷志，于讲述往事时，不经意间描绘了一幅北京版的清明上河图。其写作不仅记录胡同街巷的地方经验，也通过命名、回溯，使若干城市节点获得更明确的文化指涉。很明显，侯磊笔下的新北京文化建构，是从空间转化到时间，从生活细节营造到历史文化，这种营造不是生硬的，而是在“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的文化古城的每个生活细节中予以表现。这种味道使得他写出了《中轴线：时间的宫殿》《北平乌托邦》《方言是母乳，说方言是回家》等，他执着于北京味儿，力图把这种味道从老北京带到新北京来，而不是把现代人带回到古代去。河北作家李浩的《灶王传奇》则提供了另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空间生产范式：神话传说

1 参见刘勇、陶梦真：“京津冀文脉的历史涵养与‘大京派’文学的时代建构”，《当代文坛》1（2021）：115-122。

的现代转译。他将民间艺术及古典文学资源化入现代派的炼丹炉，把一个古老的话题写出了先锋实验的惊奇与深刻，这实际上是在“构想空间”的层面，用现代派手法重构深层心理结构。

大京派文苑的流风余韵中，女性作家的创作在这一区域化视野中获得了更具批判纵深的空间。她们不再局限于对北京单一城市性别秩序的反思，而是将穿透性的批判目光投向更复杂的阶层流动空间。她们中有北京籍或在京发展的写作者，题材广泛，涉及历史、现实、科幻、悬疑等多重领域，尤其倾耳于女性身体与城市脉动间那幽微的鼻息。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2016）以三重空间层级象征都市阶层分隔，呈现出极端的社会分化，分明是阶序森然的浮世绘卷。女主角冷眼旁观，其静默本身，便是对城市裂痕与人性渊壑最锋锐的剖解。科幻，为女性反思空间提供新的介质。现实主义写作中，女性作家同样介入都市空间的讨论，她们以各自的棱镜，折射着时代光谱，探入空间的褶皱与裂隙。

五、结语

本文考察了京派文学从“京派”到“新京派”再到“大京派”的历史演进，如何参与并塑造了北平——北京——京津冀的区域空间想象。在文学的空间生产中，社会关系、历史记忆与日常实践被重新诠释。通过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和女性主义视角，尝试描绘京派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风貌。京派文学的流变史，本质上是空间生产机制不断重构的历史。早期“京派文学”，以审美趣味对抗功利主义；进入“新京派”阶段，则以“博雅之气”塑造都市文化和市民趣味；至“大京派”阶段，京津冀三地作家共同参与城市叙事的再阐释，文学成为形塑区域文化认同的叙事媒介。与此同时，性别化经验使京派文学的空间叙事呈现出更细密的分层结构——女性在隐秘空间与半公共空间中行动、观看与自我叙述。

本文尝试将空间生产理论与中国地方性书写实践相结合并进行对话，尤其突出了性别维度在空间生产中的批判性潜能。未来可考虑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区域或跨文化比较，检视不同城市文学传统下空间生产的异同。从“京派”到“新京派”再到“大京派”的种种传承式创新，或曰创新式传承，可与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对仿古文风的批评形成对读：“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鲁迅杂文选》191）。历代京派作家们普遍在发出属于自己的、当时当刻的声音，以此呼应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区域、性别等多重张力中不断寻找精神栖居的努力。女性、男性，精英、草根，本土、外来，共同争夺话语权；文学嵌入街巷、霓虹、地铁、黄昏与尘土；女性作为城市居民与叙述者，贡献了不可抹去的抗争印记。文学并非城市的注脚，而是其肌理本身。城市与文学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幅无限丰饶又时刻生长的文化地图。总之，本文对京派文学中的空间生产进行了探索性的

论证；然而，文学与城市的复杂联结仍有待更多视角和方法的补充与验证。希望本研究能为相关议题提供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Works Cited

戴潍娜编：《光年 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年。

[Dai Weina, ed. *Light Years 3: City of Birth and City of Memory*.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年。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Liu Huaiyu et al.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22.]

凌叔华：《酒后》。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年。

[Ling Shuhua. *Intoxicated*. Beijing: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2004.]

刘勇、陶梦真：“京津冀文脉的历史涵养与‘大京派’文学的时代建构”，《当代文坛》1（2021）：115-122。

[Liu Yong and Tao Mengzhen. “The Historical Nurturing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ra of ‘Great Jingpai’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 (2021): 115-122.]

鲁迅：《鲁迅全集》第 5 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 年。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5.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2021.]

——：《鲁迅杂文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 年。

[—, *Selected Essays of Lu Xun*. Nanjing: Yilin Press, 2023.]

孙郁：“从京派到新京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6（2022）：1-7。

[Sun Yu. “From the Jingpai to the New Jingpai.”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2): 1-7.]

田时雨编：《一个真实的林徽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年。

[Tian Shiyu, ed. *A True Lin Huiyin*. Beijing: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2005.]

王蒙：《王蒙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年。

[Wang Meng. *Wang Meng's Academic and Cultural Essays*.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1996.]

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年。

[Xu Zechen. *Northward*.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8.]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

[Yan Jiayan. *History of the School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9.]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年。

[Zhou Zuoren. *Art and Life*.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1.]

——：《周作人书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年。

[—, *Letters of Zhou Zuoren*.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1.]